

目 录

总 序	(1)
第一章 古籍版本的概念	(1)
第二章 古籍版本的收藏简史	(7)
第三章 古籍版本的类型 ...	(15)
第四章 历代古籍版本的特征和 代表作	(60)
第五章 古籍版本的鉴别与收藏	(101)
第六章 古籍版本常见的作伪方法	(130)
附 录 近年海内外古籍善本 拍卖行情	(136)

第一章

古籍版本 的概念

古籍是近代人对古书册的习惯称谓，也是一个笼统的说法。究竟何种书册可以定为古籍，刻印或成书的年代界限划在何时，内容与外形上有无限定，至今文化界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

据笔者了解的情况来看，目前存在两种认定古籍的方法。

其一，以时间来认定，既然被称为古籍，当然是指出现年代较早的书册。这里又分三种划分方法：①将鸦片战争，即将 1840 年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前出现的书籍著作称为古籍。②将辛亥革命，即满清王朝倒台

以前出现的书籍著作称为古籍。③将“五四”运动,即新文化运动以前出现的书籍著作称为古籍。

其二,以印刷装帧来认定,即将木刻本线装书以及此种印刷装帧以前的各种装帧的印本书,抄本书,写本书、帛书等称为古籍。

版本,辞海的释义为:“一书经过多次传写或印刷而形成的各种不同本子。指书籍制作的各種特征,如书写或印刷的形式、年代、版次、字体、行款、纸墨、装订、内容的增删修改,以及一书在流传过程中所形成的记录,如藏书、印证、题识、批校等。

2 我国有 5000 多年的灿烂文明,汉字的出现也已 3500 多年,这以后形成的文献典籍,实在是浩如烟海。从竹简木牍到帛书纸卷,又发展到书本册页,从手抄手写到雕版刻印,进而活字排印,出现过多种变革。就是同一本书,由于各方面不同的需求,也有重刻、翻刻、官刻、私刻、坊刻、初刻、石印、补板等,不知经历多少年,经过多少人之手,再加上各种具体情况的不同和原本的差异,刻工印工水平的区别,用纸用墨的不同,校勘的精劣,就可能使这部书形成许多版本,而这些版本之间的好坏差别往往又是巨大的。例如:屈

原的《楚辞》就有 30 多种版本,司马迁的《史记》有 60 多种版本,曹雪芹的《红楼梦》有 40 多种版本,并且不断还有没有见过的版本出现。

一本书的不同版本如此之多,这就使得各种版本之间必然会出现文字、内容、纸张、卷册、装帧等方面的差异,有时差异之大令人咋舌。因为有些书的内容不合当权者心意,因而被审改删节,甚至失去本来面目。也有些刻书之人,自作聪明,任意修改原本,使其变样,再有些书坊主人为追求利润,不认真刻印校勘,又随意增删变动,因而使得刻印出来的书籍远不及原本质量,影响原书的传播。

鉴于此种情况,读书人为读到和收藏到好的书籍,获得真正的知识,就不得不认真研究手中的每一部书的版本的情况,考究其真伪优劣,并用不同的版本进行比较,以选取精良真实之本,淘汰粗劣伪造之作。这便形成了版本之说。

版本一词,起源于唐代中期雕板印书之后,那时期人们常把写抄本的书称为“本”;把雕板印的书称为“板”或写作“版”。在此以前,只有“本”的说法,“本”字含义,清代叶德辉在《书林清话》卷一里有这样一段话:“书之称

本必有所因，《说文解字》云：‘木下曰本’。而今人称书之下边曰‘书根’，乃知本者，因根而计数之词。”由此可见“本”最初尚有数根计数之意，难怪今人计算书时仍有一本二本之说。

书籍称为“本”在典籍中出现是从西汉开始，汉成帝时光禄大夫刘向，领校宫中五经秘书。他的校书方法，如北齐樊逊所谓“合中外书若干本，以先比较，然后杀青”。刘向此次整理国家藏书，汉成帝事先曾接受奏请，派谒者陈农到全国各地搜访遗书，从而使刘向获得书籍的各种传本，为整理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刘向的《别录》中有“讎校，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为讎。”这里所谓一人持本，即有手持书本之意。而他所籍的众本有所谓中书、外书、太常书、太史书、臣向书等本。由此可见，“本”开始有了不同写本的意思。只是当时还没出现纸质的书本。

随着纸张的发明和生产，“本”的涵义也开始扩展，这就是所谓：“杀青治竹所书，改治已定，略无讹字，上素之时，即就竹简缮写，以其为书之原本，故名之曰‘本’，其后竹简既废，人们就书卷互相传录，于是‘本’之名，遂

由竹移于纸，而一切书皆可称为‘本’矣。”至此，“本”的含义与现今已相差无几了。

到了南北朝，“本”的名称沿用已经十分普遍。北齐颜之推所著《颜氏家训·书证篇》举了许多本子：江南本、河北本、俗本、江南旧本、江南古本等。颜之推在这里所举的本子，均为写本，也称旧本。唐太宗贞观四年敕：“经籍讹舛，今后并以六朝旧本为证”明确提出把旧本作为校勘古籍的依据。但在当时除了写本之外，还有碑本，也就是后世称的拓书、石本。

唐中期后，雕版印刷开始出现，一书刻成，相率模印。此时人们开始将写本书、抄本书称为“本”，将雕版印刷之书称为“版”，其主要原因大约是运用了雕板之故。又由于镂板刷印与手工抄写都是为了成书成本，因此在有写本抄本的情况下，有版本一词也就不奇怪了。

唐以后，版本书逐渐多了起来，并渐渐地取代了写本书。这时“版”、“本”二字的连用以及“版本”一词的正式出现，开始见诸于宋代文献。这时所谓的版本，已基本上是专指雕板印刷而成的书籍了。米芾的《海岳题跋》卷一云：“唐僧怀素自叙，杭州沈氏尝刻

版本。”叶梦得《石林燕语》云：“版本初不是正，不无讹误。世既一以版本为正，而藏书日亡，其讹谬遂不可正，甚可惜也。”王明清《挥尘录》云：“蜀中始有版本。”陆游《老学庵笔记》云：“伊少稷日能诵麻沙版本书厚一寸。”等。

这里的蜀本，麻沙本已与今日的概念相同，可见南宋以后，版本一词已正式形成，其最初的概念比较窄一些罢了。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印刷的书籍也不断增多，印刷技术日益完善，版本概念的涵义也在不断扩展，从宋元明清到今日，它有了许多新的内容，把它与古籍结合起来就成了专门的学问，了解与研究这方面知识对于喜欢收藏与欣赏，阅读和学习古籍的人来讲是大有裨益的。

我们现今所说的“版本”的概念应包括各种写本、抄本、稿本，以及它以前的木简、缣帛、卷子和它以后的雕刻本、活字本，还应包括近现代的铅活字本、影印本，甚至现代化的缩微胶卷、平片、电子出版物等。由于现存的古籍书册主要是写抄本、雕刻本和活字本，因此古籍版本也就指这三种而言，而其中占绝对比重的又只是雕版刻印的书籍。

第二章

古籍版本的 收藏简史

收藏是一个极奇特的现象,仔细观察,并不仅仅是人类独有,一些动物也会搞收藏活动,只不过大多都是收藏一些食物,以备饥荒。人类的收藏想必也是由此开始,收藏也是随着生存的需要而变化。但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社会的进步,人们的收藏开始演变,开始注意到衣食以外的东西,对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加以搜集,起初只为满足自己的占有欲和某种需求,进而发展为对自己收藏的物品进行比较研究,并将得出的心得指导进一步的收藏。

自从人类发明文字,有了书籍以

来,藏书就成了许多读书人最大的爱好,并由此发展成人类收藏的最大项目,它极大地保护了人类文化遗产,传播了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

我国的书籍收藏历史悠久,队伍庞大。并几乎从一开始就出现了双轨,即官藏与私藏同行。据文献记载,春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老子在周朝所任的官职“收藏使”即是替周王室收藏与管理书籍的官吏。这大概是现今我们知道的最早的有关官方收藏书籍的资料。

与此同时,私人的藏书也达到了一定的规模。战国时著名的哲学家庄周在其所著的《庄子》一书中,曾写到:“惠子多方,其书五车。”惠子即惠施,也是战国时期的著名哲学家,这就是“学富五车”的来历。那时文字是刻在竹简上的,因此惠施的藏书有五车之多,在当时也是十分可观的。

由此可以看出,远在春秋战国时代,我国的藏书活动就有了相当规模,并已形成了官府藏书和民间藏书的两大格局。这其中官府的藏书包括皇室的收藏,大抵随着政权的兴衰而兴废,其收藏也有一定的政治标准,在收藏了许多善本珍籍的同时也毁灭篡改了许多不合当权者心意的书籍。每遇战

乱纷争,政权更迭,官方的藏书往往成了抢夺毁坏的重点。尽管如此,由于我国具有保存典籍,爱护遗产的传统,因此,历朝历代的皇室、官府还是收藏了不少书籍,虽历经战乱,多遭磨难,还是保留下来许多珍贵的书籍,并整理出历代官家藏书目录。

·私家藏书自战国以后,经秦代一次浩劫,直到汉代才开始恢复并进而盛行。《汉书·河间献王传》,记述西汉景帝时的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间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意思是刘德从别人手里得到好书,就很好地抄写一部还给原主,而把原来的正本留下自己收藏。同时他还用重金收购天下遗籍。故有“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的说法。因此献王“得书多,与汉朝等。”由此可见私家藏书,献王刘德不仅喜爱旧本传本,而且收藏量也与皇室相差无几了。

三国时,王修藏书较为有名,据《三国志·魏志·王修传》载:“修家不满十斛,有书数百卷,太祖叹曰:‘士不妄有名’。”据现今记录,三国时总共出书 1122 部 4562 卷,王修一人就藏有数百卷,真是不简单。

汉代发明了纸,于是有了纸书的

出现,使得原来的竹简木牍书籍体积一下子变得小多了,重量也轻多了。故西晋时,范蔚藏书有 7000 余卷,这若还是竹简木牍的话,是很难做到的。与范蔚同时代的张华,也极喜爱藏书,有记载说他“身死之日,家无余财,惟有文书溢于九筐,尝徒居,载书三十乘。”私人藏书已到了令人难以相信的地步。

到了梁朝,伍昉“愤集无所不见,家虽贫,聚书至万余卷。”连当时的高祖都要向他借书看了,可知私人藏书之盛况,这从一方面又极大地弥补了官藏的不足。

雕版印刷技术在唐代的出现,显然是书籍印刷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也是书籍出版的一大突破。唐以前的写抄本书,需一部一部地人工手抄,不但费时费工,而且产量有限,质量也难以保证。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使出书量一下子大增起来,出书也变得容易多了,“市人传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书籍印刷的简便,书籍的增多,给喜爱收藏书籍的人士创造了极好的条件,有力地推动了私人藏书活动。据统计,隋唐出书 10036 部,173324 卷,这其中很大一部分为私人收藏了。其收藏规模也越来越大。如韩退之诗中有:

“邨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

宋元时期，随着科学文化的发展和雕版印刷术的成熟，刻书事业变得较为普遍。上至宫廷内府，下至道府州县，包括达官贵人和一般文人学子在内的各色人等都在竞相刻书印书，形成一股风气，使雕版印刷走向鼎盛，也使得民间收藏书籍成了一种风尚。一次，宋高宗征求天下遗书，陆游的父亲陆宰一下子就开出一张写有 13000 多册书籍的藏书单，可见陆宰藏书之多。陆宰死后，儿子陆游又继续添购，家中的书籍越来越多，后来干脆就将自己的住屋称作“书巢”。每当来了客人，想参观一下“书巢”时，陆游引人前往，总是被书堵着难以进去，即使勉强挤进去后又往往被书围着出不来，于是只好承认“真是书巢啊！”

然而在当时，陆游家的藏书还不算最多。最为有名的应是陈振孙，家藏书籍竟达 51000 多卷，名士宋敏求、李公择、晁公武也各藏书达三四万卷。这些藏书家们同时又是极有学问的读书人，他们不但藏书而且著书，晁公武和陈振孙都分别撰写了宋代有名的提要书目《郡斋读书记》和《直斋书录解题》。至今都是我们了解和查检宋版书最好的工具书。

元代的杨士奇，早年有志于学，14岁时成为私塾教师，颇有收入。但只是因喜爱藏书，每每入不敷出，弄得家中生活困难。一次他想买两册《史略》，因价钱太贵付不起，硬是求老母亲将家中一只养了多年的下蛋鸡添给书主，才将书购回。

到了明清时期，我国在官藏图书方面达到极盛时期，私家藏书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旺。先后涌现出一些藏书家群和一些大藏书家。如：我国现存最古的藏书楼浙江宁波天一阁主人，明嘉靖年间进士，官到兵部右侍郎的范钦，阁藏书籍达70000多卷，其中有许多珍本秘籍。明末常熟汲古阁主人毛晋，积书84000余册，多为宋元刻本。清初常熟绛云楼主钱谦益得刘凤、钱允治、杨仪、赵琦美四家藏书，又广为搜罗，积有73大椽，共100000余卷，所收也多为宋元刻本。据《牧斋遗事》云：“大江以南，藏书之富，莫过于钱。”可见收藏之多。

此外，明项元汴的天籁阁，清钱曾的述古堂，清瞿绍基的铁琴铜剑楼等也都是藏书极其丰富的私家，据叶昌炽《藏书纪事诗》一书所收材料统计，自宋初到清末，历史文献记载的著名藏书家就有1000多人，他们其中绝大

多数都是饱学之士,其书籍的收藏不但为国家民族保存了大量文化古籍的宝贵遗产,同时也对他们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使他们能在某些领域作出杰出的成就。

例如,李清照与丈夫赵明诚,由于收藏了2000多卷金石碑刻,并在此基础上作进一步研究,最终合著了《金石录》一书。清代文学家,《随园诗话》的作者袁枚,家有藏书万卷,他有一个爱好,就是特别喜欢收藏食谱,经多方收集,最终集有几百种之多,根据这些食谱,袁枚写出了《随园食单》这部200年前最重要的烹饪理论著作。

据统计,自西汉至清末,在长达2000多年的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中,我国共出版了各类书籍约有181755部,2367146卷(根据历代编纂的近300种书目统计)。然而经过历代战乱烽火的毁灭,岁月流失的淘汰,存留至今的只有七八万部。这些无价之宝能得以保存下来,除了皇室、官府、寺庙收藏的一部分,民间百姓收藏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这是因为每逢战乱纷起,政权更换,皇室、官府、寺庙往往成了烧杀抢掠的重点,所收书籍在劫难逃。倒是散落在民间百姓家中的古籍版本,通过藏匿、转移等方式得以保留下来。

民间个人收藏古籍版本,既为国家民族保留了古代文化遗产,又满足了个人爱好,促进了自己文化修养的提高,因此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应该予以大力提倡与引导。

第三章

古籍版本的类型

唐以前的书籍全是写本，自雕版印刷书籍出现以后，才有“版本”一词，初期“版本”的涵义颇为简单，只是相对“写本”而言。后来版本书越来越多，版本的涵义也逐渐扩大，最终演变成现在的概念。

由于写本是靠手工抄写，因此各本之间的差异，主要是讹谬脱漏。而版本由于工序较多，形成的差异就比写本复杂多了，它存在着版式、字体、刀法、墨色、装帧、时间、地区、刻书部门等区别。因此古籍版本类型的划分，也不能用单一的标准，而只能是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划分成不同的类型。

依据刻印时代的不同,可分为:唐卷子本(图1):唐代虽发明了雕版印刷术,但雕版印刷制作的书籍流传下来的却非常少见。今天所能见到的多为写本经卷,且多为卷子装,俗称“卷子本”,即用卷轴装订成的书籍,因唐以前写抄本均用长幅,抄成之后,形成一卷。明代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云:“唐人写本存于今者皆为长卷,如手卷之装,收藏家谓之卷子本。”

宋本(图2):包括北宋本和南宋本。雕版印书经五代至宋,已广为流行,技术也日益完善,五代刻本流存下来的极少,国内仅存文殊师利菩萨像一张,分上下两栏,上栏镌菩萨像,下栏镌“五字心真言”共52字。另有《唐韵》、《切韵》二书残卷和一些佛像,被伯希和劫往法国,现藏于巴黎图书馆。

宋代杭州、建阳、眉山等经济文化发达的城市,都成了刻书的中心。公私所刻有监司、州学、书院、家塾、坊肆等。其风格北宋质朴,南宋挺秀,字体多仿欧阳修、颜真卿体。所印各书往往成为后世刻本的依据。由于宋本的选本、刻印均十分精良,因此一直为后世读书人和藏书家所珍爱,也为研究人员所重视。

金元本(图3、图4):宋朝南迁之